

史正富 ◎ 著

超常 增长



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史正富 ◎ 著

超常 增长



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史正富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08-11385-5

I. ①超… II. ①史…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增长—
研究—1979~2049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9675号

总策划 陈昕

特约编辑 忻雁翔

责任编辑 毕胜

封面设计 储平



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

史正富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3.5 插页 4 字数 143,000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385-5/F·2167

定价 35.00元

CONTENTS

目录

1 引言

6 第一章

超常规的中国经济增长

- 一、超常增长率 10
- 二、超低的经济波动 15
- 三、快速的消费增长与效率提升 23
- 四、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 27
- 五、中国克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实践 32

35 第二章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与超常投资力

- 一、竞争性地方政府与三维市场体制 35
- 二、地方投资激励与投资水平 43
- 三、地方投资激励的长期收益 53

57 第三章

美联储与国际超常购买力

- 一、国际超常购买力的发生与成长 58
- 二、资产泡沫与消费赤字 59
- 三、产业外流与贸易赤字 62
- 四、财政赤字与美元过度发行 65
- 五、超常购买力的界限与危机 71

73 第四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历史阶段

- 一、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 75
- 二、城镇化 81
- 三、生态与环境 82
- 四、能源与资源 84
- 五、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 97
- 六、国防建设 100
- 七、积累、投资与消费 102

106 第五章
新增长阶段的超常增长

- 一、走向 2049 年的增长图景 106
- 二、寻找内生的超常购买力 112
- 三、超常购买力的投放领域 115
- 四、打造国家发展战略基金 127

132 第六章
新增长阶段的制度安排

- 一、中国三维市场体制的四大支柱 133
- 二、中国三维市场体制的比较优势 141
- 三、中国三维市场体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51
- 四、中国三维市场体制的组织变革与流程再造 164

179 附表

193 参考文献

206 索引

210 后记

引言

过去 30 多年，中国式超常增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中国发展奇迹”。回顾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增长奇迹，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中国为人类发展史贡献的东方智慧？展望未来，这一超常增长能否持续，又如何持续呢？

智者有言，如何解释历史，就决定了你如何选择未来。因此，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回答中国发展奇迹是如何产生的。

有人认为这归因于压低消费。过往 34 年，中国 GDP 中的消费占比约 59%，投资占比约 38%，相比常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消费占比低，投资占比高。然而，中国消费规模或消费水平的增长却是令人惊异的。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消费总额从 1979 年的 2 000 多亿元，上升到 2011 年的约 23 万亿元。以 1990 年不变价计，则年均增长率高达 9.0%；按人均消费计算，年均增长约 7.9%，在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中名列前茅。

有人认为这是依靠过度投资。如上所述，中国的投资率确实显著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超出东亚其他储蓄率较高的经济体。但是，以资本产出比这一综合指标来看，改革开放之初的 10 年，

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 3.38，近 10 年达到 3.95。横向来看，这一数据并不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 1965 年到 2010 年的资本产出比是 5.29，其中 2005 年到 2009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更是达到 22.64；日本从 1980 年到 2010 年的资本产出比为 14.69，其中 2000 年到 2010 年更是高达 37.16。纵向来看，中国资本产出比虽然在提高，但并非过度投资所致，而是国家重型工业化和大规模城市化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随着这一阶段的深入和第三产业的成长，资本产出比将趋于稳定或微降。

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果。的确，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保证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但是，人口红利同样先后作用于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亚洲各国，观察这些国家，不难发现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巨大差异，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

那么，中国式超常增长的根本原因何在？本书的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市场体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有机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征性制度安排的形成与演进，标志着中国已初步形成一种与西方常规市场经济有着系统性差异的、新的经济制度类型。

在这样一个三维架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中的企业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是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竞争中的地方政

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降低企业投资创业的投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均衡投资水平，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障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超强投资驱动力；中央政府在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一方面总揽全局，把握发展与稳定的平衡，另一方面抓住全球化契机，审时度势地果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有效吸纳了美国消费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提供的“国际超常购买力”，从而为中国经济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额外的市场机会。

正是这样一种中国体制产生的超强投资驱动力和国际市场的超常购买力，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得以避免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1994年后的20年中持续高位运行，创造出超常增长与超低波动并存的奇迹。

当然，中国30多年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辉煌的背后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所有者缺位与垄断经营、收入差距过大与收入分配不公、政府规模过大、市场失序、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等。这些问题或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伴生现象，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内生结果。这些弊端的克服和解决不可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而只能诉诸政府行政改革。如果说前30多年改革的主题是解构计划、创造市场的话，那么，下一轮改革的主题就是政府部门的组织变革和业务流程再造。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完善，新的增长阶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制度基础仍将有效运行，但是，国际超常购买力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将消失殆

尽。长期来看，虽然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等预示着未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但它们只是市场经济常态运行下的需求，对应的只是市场经济的常规经济增长。如要实现前述超常增长，则需要市场体系之外的某种第三方需求。过去，它是以美元超发为基础的国际超常购买力；今后，有什么类似的长期购买力可以替代它呢？

问题的提出实际已经预示了问题的答案。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常规运行下，中国的储蓄规模必然过大；另一方面，未来增长的供给方面存在着诸多约束，从能源保障、生态环境建设，到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等各个领域，都需要长期巨大的资金投入。相对自然环境良好的欧美国家而言，这是打造国家基础资产所必需的“额外投资”，相对国民幸福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目标而言，这是构造和谐社会必需的基础工程。可见，实现未来超常增长的关键，在于寻找到能使过度储蓄与额外投资相联结的恰当机制，从而使两方面的难题同时解决。

为此，设立综合性的国家发展战略基金就不失为一种选择，即实施对生态资产与战略性资源的长期投资，在为常规市场运行注入超常购买力的同时，建设并永续运营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这是本书提出的关键设想。可以说，对生态建设、国土整治、能源资源、人力资本等战略性瓶颈要素的投入，即这些作为超常购买力出现的投资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公共工程”，而是中国长期发展与人民长期福祉所必需的战略性的基础工程；只要运作正常，它极有可能成为回报较好的长期投资。

可以充分预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华诞之时，在 GDP 总

量和人均 GDP 上，中国都将成为世界领先国家。届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在全球范围的制度竞争中，显示出巨大的制度优势；作为有别于西方经典模式的发展道路，它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最重要的制度基础时，也为人类制度文明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从而为世界范围的文明和制度多样性贡献出中国智慧。有了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自己的路就一定能走稳、走好！

C第一章 Chapter one

超常规的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 34 年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观。说它是奇观，不仅仅由于经济增速快，更为要者，中国增长道路已经突破了目前已知的发达国家工业化模式。

众所周知，现代近 200 年来的国家工业化，是从英国发轫并率先完成的。此后扩展至欧陆以及美、加、澳、新；在亚洲，则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形成了本质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基本制度便是基于私有企业的市场经济、基于政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基于立法博弈与程序公正的法治社会，以及基于国家(地区)利益的国际竞争。这一套制度架构之下的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至今仍被广泛接受为正统的、或者说是“正常”的“现代化”模式。

然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却走出了一条与上述主流模式不同的发展道路。从增长速度、经济周期、政府结构功能，到收入分配与财富的社会分布等重要方面，中国经验都展现出与先发达各国不同的新特征。如果把上述先发达国家(地区)的发展模式作为“常规”的经济增长，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就是“超常规”的。

最先发现和论述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是林毅夫教授；不仅如

此，他还从中提炼与逐步发展了“新结构经济学”。^①他提出一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决定该国具有自生能力的优势产业，故产业升级的前提是要素比较优势的变迁；而比较优势与优势产业的发现与成长必须基于市场内的企业竞争，但也非常需要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产业甄别、产业升级的促进与引导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应该说，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既揭示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奉行“赶超战略”的失败教训，也论证了市场经济中政府实施发展政策的成功可能。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为理解中国发展经验提供了现代经济学的学术基础。

但是，政府如何保证甄别出来的扶持产业真的是符合比较优势、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呢？要解答这一问题，就必须理解经济制度的运行。就中国而言，就是要解读当下正在运行中的经济制度。

对于中国当下经济制度的运行，学术界的研究不多，这是因为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把它当做过渡性的临时制度安排，并认为最终是要随着改革的深入“转型”成为某种西方常规的市场经济模式。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旅美中国学者钱颖一教授与许成钢教授率先提出过中国政府的M型结构理论，即中央政府统一政治领导下的地方分权结构，促成了中国非国有部门经济及横向市场联系的发展。^②钱

①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张建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林毅夫等：《新结构经济学文集》，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② 钱颖一、许成钢：《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M型的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载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颖一教授后来又与斯坦福大学的巴里·温加斯特教授合作，将上述地方分权思想上升为“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强调了将中央—地方权力划分制度化的重要性。^①但是，他们没有正面解析中国政府 M 型结构或“经济联邦制”的实际运行过程。此后，若干学者就地方分权对经济增长以及基础设施发展、城乡差距、官员晋升、财政支出方式等具体问题的影响，进行了统计实证研究，但也未真正涉及中国当下经济制度如何实际运行这一主题。

张五常教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在这方面取得了关键性突破。^②根据张五常教授的理论，当下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基于地方竞争的分层合约制；由于地方为发展而竞争，地方政府实际上参与企业发展的引导激励、土地投入以及支持服务等具体方面，因此政府从企业取得的财政收入中就有一部分不再是“税”，而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租”。对“税”的最大化追逐意味着政府对市场运行的破坏，而对“租”的追求则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市场运行水平。显然，这一理论为用现代经济学方法解释中国当下经济制度的运行提供了全新范式。

本书承接张五常教授的理论贡献，将对竞争性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主体这一关键事实加以进一步深入考察，试图揭示它对政府行为方式、市场体系运行及宏观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说明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制度支撑，同时也为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中政府产业甄别问题提供有意义的微观基础。

① 钱颖一、巴里·温加斯特：《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载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文献已被收入论文集，见张军、周黎安编：《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中国经济增长的超常规性可以从制度安排与经济运行两大角度分析。下文即从经济运行的角度进行讨论。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两大显著特征。

一是经济增长率前所未有。一方面,高速经济增长的时段已达34年,且多数经济学家预测这样的增长表现至少会延续到2030年。也就是说,经济高速增长的时间跨度至少将达到50年以上。这一纪录超过了迄今为止所有国家的增长纪录。另一方面,在这34年的时间跨度内,中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最高。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2011年的34年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率为9.98%,人均GDP增长率达8.80%。^①即使被世界银行称为“奇迹”的日本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它们的经济增长率也未达到中国的高度。^②

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34年中,中国不但经济增长率超越常规,同时,整个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显著低于其他国家。其实,超常规的高增长率和超低的经济波动,两者紧密相连。从数据上来看,经济波动的幅度过大,必然拉低同时段的平均增长率;在同样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经济波动程度越大,实际的经济增长程度就越小。

①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

② 韩国1963—2002年GDP平均增长率为7.998%;新加坡1961—1997年为8.635%;日本1950—1973年为8.92%;中国台湾1962—1994年为9.03%;中国香港1962—1988年为8.626%。参见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1983,1985,1996,1997;“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April 2007;中国台湾“经济计划和发展委员会”;《台湾统计资料手册·2007》,载刘震辉、张平、张晓晶:《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中国能够在超常增长过程中经历较小的经济波动，更凸显其增长经验的独特性。

中国能够成功克服常规市场经济国家屡见不鲜的周期性经济波动，从而实现超常增长，除了得益于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根本原因在于：通过改革开放与自主制度创新，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基本实现了相融互动，进而产生了可持续的超常投资力。从一般经济学理论来看，这是中国在市场和政府关系的探索中取得的重大突破。

一、超常增长率

中国经济增长的超常规性首先体现在年均增长率高，过去 34 年的增长纪录在现代经济增长史中是史无前例的。^①

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超常规性心存怀疑。有学者认为很多国家也曾较长时段内实现过经济高速增长；还有学者以中国增长过程中遇到的良好国际环境为由，来淡化中国经济增长的难度。为此，需将中国上述的增长纪录，放在具有比较意义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观察与分析。在这里，有必要提出“国家工业化基本阶段”这一概念。原因在于：首先，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其增长率也应是不同的；其次，对处在经济发展前沿的国家和后发跟进的国家，也要加以区分，因为后者具有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年版。

向前者引进技术、进行模仿，从而提高发展速度的机会。

就现代经济增长史而言，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作为启动国家，处在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沿；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地位，成为新的引领世界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前沿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及同为英国衍生国家的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均实现了长期经济增长，跃居发达国家之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与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亚洲四小龙”，通过采取赶超战略，经过较长时段的高速经济增长，相继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最后，在近几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中，不少新兴经济体都实现了良好的经济增长，其中以印度的高速增长最值得重视。这里，我们选择几个代表性的国家与中国作一比较。

表 1.1 不同国家工业化阶段的平均 GDP 增速比较

国 别	发展阶段	相关时段	年均 GDP 增速(%)	人均 GDP 增速(%)
英 国	前沿国	1820—1870 年	2.05	1.26
美 国	跟进—前沿国	1870—1913 年	4.04	1.82
日本(1)	赶超国	1950—1973 年	8.92	7.70
日本(2)		1950—1984 年	7.20	6.09
印 度	赶超国	1990—2011 年	6.47	4.66
中 国	赶超国	1978—2011 年	9.98	8.80

资料来源：英美数据来自[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日本数据来自日本统计局：“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Japan—Gross Domestic Product Classified by Economic Activities—68SNA”，以 1990 年为基年。

印度数据来自 IMF，“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October 2012。

中国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年版。

显而易见，越是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其国家工业化阶段的长期增长速度就越快。英国最先开展工业革命，实现国家工业化并成为当时世界领先经济体，但其间平均增长速度按今天的标准看仍比较低，仅为 2.05%；中国 30 多年的增长速度是其 4 倍强。其后，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因为有了后发国家的“模仿、引进”的优势，其国家工业化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英国显著高出一截。其中美国更是于 1906 年在人均 GDP 上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经济领导国。^①但是，这期间美国年均增长也仅为约 4%；中国与之相比，经济增长率是其约 2.5 倍。日本在 1950 年以后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曾被美国学者高呼为“日本第一”，世界银行称之为“东亚奇迹”。^②但日本的高速增长纪录也低于中国。以 1950—1973 年这一短时段为例，日本人均 GDP 的增长率接近于中国，仅低了 1.1 个百分点（7.70%与 8.80%）；但如果对 1950—1984 年这一时段进行考察（1973 年后日本经济增长放缓），则日本人均 GDP 的增长率为 6.09%，比中国低了近 3 个百分点。由于日本经济 1984 年后进一步衰退，增长率长期低迷，如果对 1950—2010 年进行整体比较，则日本与中国的差距就更大了。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改革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加快，1990—2011 年平均超过 6%，与中国同被列入“金砖国家”。但中国与之相比，年均 GDP 增速仍高出 3.51 个百分点。

① 美国人均 GDP 于 1906 年超越英国，参见 Robert Gordon, “Is U.S. Economic Growth Over? 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2010”,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1。

② [美]埃兹拉·沃格尔（现译名：傅高义——作者注）：《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谷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 年版。